

改革開放以來大陸教會發展的一些反省

李震

首先我必須指出，這不是一篇嚴格的學術性或歷史性論文，因為我的專業不是歷史學，也不是研究中國大陸教會的專家，而只是就多年來對它的發展累積的一些觀察和對大陸教會的一些直接接觸和體驗所獲得的訊息及資料，提出供諸位先進參考，並請不吝賜教。

從文化及社會的訊息觀察中國教會

八零年代以來，改革開放政策帶來的改變和影響，可見於以下幾方面。

(一) 私產制的建立、入憲和資本家、企業家的加入共產黨問題。

依據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四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中有關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條文如下：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第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

第十一條 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並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制監督和管理。

第十三條 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不受侵犯。

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和繼承權。國家爲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徵收或徵用並給予補償。

有關資本家、企業家加入共產黨的問題，據江澤民在交出政權之前，深盼國內的企業家入黨，但因之前的《中國共產黨黨章》設定爲無產階級的政黨，因此必須修改黨章。

依中共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四日通過修改的黨章，在《總綱》中有下列重點值得注意：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爲自己的行動指南。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的立國之本。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中，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第一章「黨員」之第一條 談入黨的條件：「年滿十八歲的中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願意參加黨的一個組織並在其中積極工作，執行黨的決議和按期交納黨費的，可以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的條件中，已沒有必須屬於無產階級的條件。

(二) 經濟開放和政治改革失衡的矛盾現象。
過去二十多年來，市場經濟發展快速，其成就

亦受到國內外人士的普遍肯定，確已使十三億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富了起來。但由於經濟開放的快速成就與政治改革的牛步及落後形成對比，使群眾和幹部的不滿日益強烈。再者，各級幹部的貪污腐化現象，法治精神及制度之建立無門以及犯罪事件之快速增長，造成社會人心的不安。台灣的《民權時報》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九日報導：

陸委會委託學者調查顯示，中國大陸五百萬人擁有千萬人民幣以上資產，二億人生活在貧困中，最富有家庭與最貧窮家庭擁有釜融資產的比例相差三五九倍。大陸城市內部人均家庭收入「基尼係數」達零點五六一，根據國際衡量居民收入差異狀況之「基尼係數」指標，人均家庭的收入差距若達零點六以上，就可能出現動亂。

陸委會委託銘傳大學助理教授許志嘉所做的研究調查發現，在房地產方面，全大陸最昂貴的豪宅座落在上海，一棟房子售價達一億三千萬元人民

幣。與此同時，大陸各地也不時傳出因為抗議拆遷住房無家可歸，走上街頭抗爭的事件。

此外，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情況也日益明顯，大陸目前已有五百萬人是擁有千萬人民幣以上資產的富豪，其中的二萬人，身價還達到一億人民幣。相對起來，農村地區均年收入在六三七元人民幣以下的絕對貧困人口，約有三千萬人，計算到年均收入在八百元人民幣的不穩定脫貧人口，大陸農村貧困人口總數達到一億人。

大陸官方統計數字指出，大陸有五千六百萬人生活在貧困中，但世界銀行評估，大陸貧困人口多達二億，住在中西部、山區、偏遠地區的農民尤為貧困；城鎮貧民則以下崗和失業工人為主，佔城鎮貧困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至於富人方面，私營企業主和黨政幹部是主要的富有族群。

(三) 基層群眾的抗議、抗爭事件不斷增加。

二零零五年七月號《爭鳴月刊》報導：「六月十四日晚上，國務院召開了各省（區）直轄市黨政

主要負責人會議，就社會不斷發生暴力抗爭事件，做出通報。會議由周永康主持，溫家寶作了指示。」

報導指出，周永康承認：發生規模性抗爭事件的因素十分複雜。從若干宗抗爭事件的調查來看，主要原因是有關部門違法，侵犯了群體利益，群體爲了爭取應有利益而得不到保障，才自發組織起來抗爭。周又透露：不少群體抗爭活動，得到社會較廣泛的支持，這對黨政領導拉響了政治危機警報。該文又報導說，

據有關方面統計：今年（指二零零五年）以來至六月十二日，全國有九十二個地區發生了三百四十一宗有組織的群體抗爭和規模性武裝抗爭事件。其中萬人以上十七次，五千人以上的四十六次，千人以上的一百十二次；傷亡一千七百四十人，其中死亡一百零二人。公安、武警、地方幹部傷亡四百八十四人，其中死亡五十五人。二百二十二幢政府建築物受損，一百十四輛政府車輛被焚毀，六十二座倉

庫被搶，直接經濟損失約爲三百四十億至四百億元。

（四）民主體制的吸引力。

下面的小故事可能有很大的象徵意義，蘇起報導：連戰訪問北京，在北大演講後離去時，他在車中看到，有一位大學生手中舉著一塊紙牌，上面寫著：「民主西向，統一中國」八個字。

超越了二十世紀在中國前後二次文化革命運動的新新文化運動。

（一）中華民國初年的新文化運動，由右傾的胡適之，左傾的陳獨秀領導，藉科學、民主、自由之名，打壓宗教。毛澤東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企圖徹底毀滅中國七、八千年的傳統文化，消滅宗教。二者歷史背景不同，但很難否定其中的關連。

（二）四人幫之亂彌平之後，中共亦肯定文化大革命爲我國歷史上的大災難，也促成了知識分子

的反省與覺醒，逐步肯定宗教信仰的客觀及普世性價值。海峽兩岸有類似的情況。

(三) 中共文革後，在文化、學術和教育政策上的動向與改變：一方面鼓勵學者、大學教師回歸中國文化，肯定在古典的哲學、文學中，可以找到國人所需要的智慧。

另一方面又有意阻擋學者、知識分子過度靠向西方文化，因為靠向西方文化勢必阻擋不了與其核心價值，即耶穌基督的宗教信仰接觸，但此一想法及措施由於內在矛盾所產生的無力感，顯然擋不住知識分子的期望與追求真理的良知。

(四) 文化基督徒現象湧現。浙江大學基督教研究中主任陳村富指出文化基督徒的起源：

這批自八十年代在中國大陸文化界產生的研究基督教的學者，他們來自下列各方面：1. 原來的教會大學。這一成分的人員極少，年歲已大。如傅樂安，曾鉅生。2. 文革前的歷史系，如胡王堂，徐明德。3. 文革後大學畢業

的青年學者。特別是七七、七八、七九年級學生，質量相當高。……4. 海外留學人員。……

如劉小楓、趙敦華。

然後他談到這些學者所產生的積極作用時指出：「一、撥亂反正，糾正宗教理論方面的『左』的錯誤，被宗教界和政府接受，為落實宗教政策奠定了理論基礎。二、翻譯和介紹歷代基督教文獻和二十世紀神學理論，傳遞當代世界宗教研究和發展信息。(例如「道風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在劉小楓的領導之下，出版了《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分為古代、現代和研究三系列，都是由大陸學者所譯，受到國內外人士的肯定。)三、收集、整理、編纂基督教在華傳播的歷史資料，研究基督教在中國發展的狀況和前景，探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相結合的途徑，尋求建立漢語文化圈的基督神學理論。」(陳村富，1997，頁6-23)上述「研究基督教的學者」可以說是廣義的「文化基督徒」。這些學者中有一些也是狹義的文化基督徒。

許志偉教授在《「文化基督徒」現象的近因與神學反思》一文中指出，劉小楓在一九九五年給文化基督徒的定義是「文化基督徒的標誌是信仰耶穌基督，積極參與，但不受洗禮或參加某一教派，超乎教會、教派之上。」

爲此許志偉將上述界定歸結爲三點。他說：「文化基督徒與傳統定義下的一般基督徒之共同點是：一·認信耶穌基督。二·承認新約、舊約《聖經》，並表示一切以此爲根據。」

(五)自九十年代興起的基督教熱現象。基督教熱自八十年代初就開始引起中共當局的注意，一九八二年的《十九號文件》的目的之一，即是昭告共產黨黨員，爲什麼在經過長時期的打壓之後，基督教仍未走向消亡。一方面由於科技發展的落後，人民的生活仍然貧困；另一方面也指出宗教的存在不是政治力量可以消滅的，於是提出鄧小平的宗教政策，雖然仍然肯定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馬克思無神主義的不變原則不能放棄，但另一方面也

不能不承認宗教仍有某些價值，爲此對宗教信徒實施統戰政策有其時代性的必要，換言之，在定點、定人及定時的條件之下，促使宗教爲國家所用，積極參與在社會主義旗幟下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工程。

顯然宗教熱的蓬勃發展與文化基督徒的種種有利基督教活動有著密切的關連。

(六)學者致力爭取學術自由。雖然時至今日，中共當局從未放鬆對於基本人權、宗教信仰和出版自由的不合理控制及打壓，但是仍無力阻擋由學者、專家、大學教授和知識分子多年來藉種種方式及管道所推動的，有助有利於各種宗教發展的措。譬如在許多大學先後設立的宗教課、宗教學系所，以及基督教研究所，在量方面遠遠超越了台灣。近二十年來，有關基督教著作、譯作、期刊，包括宗教學、聖經學、神學、哲學、歷史學等方面的出版品，有如雨後春筍，不是政府靠行政措施擋得住的。中國大力推動在各方面與國際接軌也是有利的因素之一。

大陸教會人口數字的象徵意義

一九四九年，天主教教友人數爲三百八十萬。基督教教友人數爲七十萬。依遠志明牧師的說法：目前，基督教人數爲七千萬，天主教二千萬。

此一說法相當可靠，因爲幾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內的一個統計數字指出：佛教徒二億二千萬、回教徒四千萬、基督徒六千萬，合共三億二千萬。

其中不包括道教徒，因道教流向民間宗教，難以統計。估計道教及其他民間宗教徒加起來可能超過二億。基督徒的六千萬中，數年前大家就肯定天主教徒有一千五百萬，那麼基督教有四千五百萬。自明末到一九四九年，天主教的傳教工作效果不佳，禮儀之爭的悲劇是最大原因，但是自一九四九年至今只半個世紀，教友人數卻增加了好幾倍。大陸教胞公認天主聖神的帶領是最大的勝算緣由，殉道者的英勇犧牲也是上主賜福的，使許多國人信服福音。

基督教找到了一個十分有效的福傳方法，即培育所謂「家庭教會」。一旦有一個家庭信主，就盡可能使這個家庭接受培訓，使之成爲一個教友聚會的小教堂和福傳工作的一個點。遠志明牧師說家庭教會普及全國各地，西藏也不例外。一個地方的家庭教會遭到取締，就設法遷到其他地區。這可能就是基督教教友人口由一九四九年的七十萬增加到七千萬的原因。

有關中梵建交一事的一些疑問

(一) 教會的使命是向天下萬民傳揚福音，使之成爲主的門徒。梵蒂岡之在二十世紀成爲一個獨立國家，並發展出所謂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此一情況是在西方歷史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一個事件，與天主教信仰的本質沒有必然關係。

在此大前題之下，是否可以說，梵蒂岡與各國建立外交關係之重要性，應建立在有助於教會在世界各地完成其傳揚福音的使命上。換言之，教廷的

外交活動本身，不是教會所追求的一個目的。教廷外交活動的意義，在於成爲協助普世教會和地方教會完成其福傳使命的一個工具。

(二)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逝世後，中梵建交一事又議論紛紛，教內不少人士認爲建交勢在必行，肯定建交之好處者亦大有人在。我的感覺是，如果研究中梵建交議題的學者、專家所設定的那些好處，大多建立在主觀臆測的判斷上，而缺乏客觀、明確的證據。換言之，建交活動如果能在正常的、合理的、互相尊重的，甚至有相當透明度的條件之下進行，並且站在教會的立場，要求中共當局保證在中國大地上自由傳揚福音的權利，同時亦應盡力顧及在台灣的福傳工作不要受到損害。那才是大家所樂於看到的。

(三)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接見全體越南主教時說：「教會基於她的角色和職權，絕不能與政治團體混爲一談，亦不隸屬於任何政治體制，正因如此，政治團體和教會各自擁

有獨立的範圍。然而，這兩者都必須爲了人類的益處而善盡各自的使命，要是雙方都能在善盡使命的服務中，進行良性的合作，效果必然會更好。爲了達到這個理想，教會本身期待政治團體完全尊重教會的獨立和自主。」

周道在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二日的《教友生活周刊》發表的「一牧一棧：中梵外交前景之見」一文中，在引用先教宗的這段話之後指出：「與梵蒂岡有邦交的一百七十四個國家都是奠基於這種認知的基礎上，除非北京能夠放棄從政治觀點看待教廷外交，重新認真考慮所開列的第一個條件並有所妥協，否則仍將陷於單國壟樞機所強調的『外界對羅馬教廷的外交，大多從政治觀點出發，這是對教廷外交的誤解』的泥沼當中。然而，要北京政府對自己開列的第一個條件有所妥協也非易事，這要從共產主義的本質及它的歷史包袱來研究。」中共所開列的第一個條件是：北京自選自聖主教，絕不容許梵蒂岡干涉中國內政。

有關「自選自聖主教」一件事上，最近已有妥協的實例。有關絕不容許教廷干涉中國內政一事須十分慎重。

在此筆者順便提醒一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中，有關宗教信仰的第三十六條最後一段，即「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始終未有改變。

(四)最近有機會與大陸一個神哲學院的資深教授交談，我請他用極簡單一兩句話說明：如果今天中梵建交，對大陸天主教會沒有好處？他的答覆是：「如果中共不放棄共產主義那一套理念和作法，對教會沒有好處！」

(五)二零零五年七月十四日，中共青壯派少將朱成虎指出，一旦美國介入台灣衝突時，必須面對中國核子彈的攻擊，美國人必須準備好數以百計或更多城市被中國人夷為平地。這與中共當局近來不斷在國際上釋出的和解善意，顯然隱含著內在的矛盾。似乎中共政權的一個日益展現的野心，即與

美國爭控制世界大局的霸權之說，實非空穴來風。顯然與教廷的外交政策有所抵觸，值得重視。

(六)當前在中國大陸的大城市，神父、修女的聖召已很稀少，但是在另一些老教友多的地方，聖召仍然不少，一方面應感謝天主的照顧，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感謝外籍傳教士長時期辛苦的耕耘！

(七)但是明末「禮儀之爭」的悲劇，仍須重新評估，記取教訓，並認真記取這一代的教宗，特別是教宗保祿六世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有關將福音融入當地或本土文化(Inculturation)的必要性的訓誨，而天主聖子降生成人(Incarnation)的奧蹟正是「福音融入文化」的神學基礎。

大陸教會發展中可能面對的危機

一·積極方面的展現

(一) 讀經活動、各種培訓班、研習會在各地熱烈展開。教區的小型刊物日益增加，都是好現象。

(二) 神職人員和教友對地上、地下合一的要

求日增，地上地下互動、互助的現象也在增加。

(三) 教友群衆的團結和抗爭活動逐漸受到重視與妥協式的尊重。

(四) 大都市男女聖召減少，但在一些地區仍然相當樂觀，培養聖召問題值得重視。筆者認為培養聖召在目前及未來均比建教堂更爲重要。

(五) 天主聖神有辦法使一些管控教會的宗教事務局幹部熱心爲教會服務。

二·負面因素和危機的展現

(一) 一團一會(指「主教團」及「愛國會」)的作爲令人失望，其無力感和不信任是解不開的問題。

(二) 自選主教之制度及過程所展現的弊病日益嚴重。

(三) 神哲學院之素質不齊，並所培育出來的神父亦有素質低落的情況，神父之間不合作也時有所聞。

(四) 在一些地方，修女普遍受到教友們的尊

重，但得不到本堂神父的肯定與尊重。爲此神父與修女之間的合作關係難以建立，在生活費方面，修女們亦時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五) 一些教區，主教或教區長與神父之間的矛盾和鬥爭時有所聞，致使教區主教之繼承人的產生，難以實現。

(六) 因缺乏勇氣，致使教區或堂區的負責人不敢向有關當局爭取合法及合理利益，實在可惜。

(七) 在中國社會中，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金錢、物質主義及享樂主義的影響日益強烈，對神職人員所產生的誘惑以及所造成的威脅，已在發酵，不能不予以重視。

以上是幾年來的觀察所得，謹此願與各位關心中國及關心中國教會的朋友分享。

□